

出版說明

中國讀者對於與我們有著複雜情緣的鄰國日本，一直抱有高度的關注。尤其是進入近代以後，其發展軌跡與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經歷了前近代國家向近現代的轉化、發展和崛起，對外的武力擴張並由此導致了戰敗。戰後的日本重新出發，社會政治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在一九七〇年代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而在近年又出現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整個社會在沉悶中孕育著躁動與不安。對於這樣的一段近現代歷程，日本人自己是如何來描述的呢？對於自己的近現代史，他們又是如何來認識的呢？這是廣大中文圈讀者所關切並抱有相當興趣的。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們選擇了日本岩波書店近年（二〇〇六—二〇一〇年）來以「岩波新書」的形式陸續推出的十卷本「日本近現代史」，聘請了一批在此領域上頗有造詣的學者將其譯成中文，推介給各位讀者。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學者或教授，他們運用

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對完備的史料，力圖對日本近現代史的各個階段作出接近史實的描繪。這套叢書可謂是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內最新的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史料豐富，敘述脈絡清晰，問世以後在日本國內廣受好評，一版再版，很多都出到了十版以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本叢書的作者都試圖秉持學者的立場，但其對許多歷史場景的理解、尤其是涉及與中國的部分，自然是以日本為本體，與我們的立場必然有差異，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並不意味著我們認同原作者的觀點，而是為我們了解和理解一般日本人對於自己近現代史的認識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素材。

這套叢書在翻譯和編輯的過程中，對正文未做任何刪節。原有的插圖和大事年表，一概保留；原文中專門詞語的表述，一般均予以直譯（必要時譯者也會給予適當的解釋）；對原文中出現的重要的人名、事件等，譯者會以腳註的形式進行適當的註釋；對原著中的參考文獻，中文翻譯後再列出原文，以便有需要的讀者可查閱原文文獻；原著中的索引，考慮到對中文讀者的意義不大，略去不用。

目錄

前言——經濟高速增长神話的誕生 10

第1章 一九五五年與一九六〇年：政治的季節……17

一、轉機的一九五五年 19

二、獨立後的政治不安 21

三、保守聯合與五五年體制 37

四、回歸國際社會 46

五、春鬥與三池爭議 55

六、《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修訂問題 65

七、五五年體制與戰後民主主義 86

第2章 投資競爭與技術革新——經濟的季節…………… 97

一、從經濟自立到收入倍增 99

二、投資及其制約因素 105

三、「技術革新」與培育新產業 114

四、「炫耀性消費」的時代 125

第3章 向著開放經濟體制轉移——經濟大國日本…………… 143

一、越南戰爭下的亞洲 145

二、轉向開放體制 159

三、證券恐慌與大型合併 164

四、大型合併與企業體系 171

五、對「增長志向」提出異議 184

第4章 物價暴漲與權錢交易的政治——增長的終結……209

一、兩次尼克遜衝擊 211

二、沖繩返還 218

三、列島改造與物價暴漲 232

四、兩次石油危機 239

五、企業的社會責任與權錢交易的政治 249

結語——經濟大國的陷阱……264

後記 282

參考文獻 284

大事年表 289

前言——經濟高速增長神話的誕生

如今，在各種媒體對日本經濟情況的報道中，以「經濟增長」為主題，因「經濟增長率」的高低起伏而時喜時憂的景象已是家常便飯，並不稀罕。然而，僅僅六十年前，在剛脫離戰敗不久的日本卻難覓此景。

這倒並不是因為戰敗的混亂使經濟增長尚屬「遙遠的夢想」，而是因為當時尚無「經濟增長」這一說法。在當時，人們也用「經濟發展」形容經濟狀態表現出的歷史性變化，但幾乎無人使用「增長」一詞，即便是專家也是如此。

經濟增長 的理論

在經濟學的專業書籍中，一九五五年前後才首次出現了書名中包含「經濟增長」一詞的書籍。在國立國會圖書館的藏書檢索中檢索「經濟增長」一詞可知，書名中最早使用「經濟增長」一詞的是

一九五四年有斐閣出版、高田保馬主編的《經濟增長的研究》第一卷，書中收錄了森嶋通夫的《關於增長經濟的完全雇傭政策》等文。此外，同年，中山伊知郎主編的《日本經濟的結構分析》上下卷由東洋經濟新報社出版發行，荒憲治郎的

《日本經濟的增長率》等論文則在題目中使用了「增長」一詞。由此可以窺見，「經濟增長」在專業人士的討論中正逐漸變成一個關鍵詞彙。

到了第二年，華爾特·惠特曼·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的《經濟增長的過程》由東洋經濟新報社翻譯出版（原著出版於一九五二年）。羅斯托之後還曾寫過《經濟增長的諸階段——一項非共產主義的宣言》（原著出版於一九六〇年）這樣題目略帶轟動效應的著作。在經濟學家等對經濟增長理論的興趣不斷高漲的背景下，《經濟增長的過程》從歷史的視角對經濟增長與景氣循環的過程作了描述。

引入「國民收入」的概念

在這一系列變化的推動下，官廳的經濟學家們也開始對經濟增長表現出明確的興趣。

而在此之前，《經濟白皮書》等政府出版物在說明日本經濟狀況時，只言及工礦業生產指數的增長率，或者通過物價變動情況，給予讀者以日本經濟活動的整體形象。都留重人作為第一本經濟白皮書《經濟實相報告書》（一九四七年）的執筆者而廣為人知。他在留學美國期間適逢凱恩斯經濟學，很早開始就向日本全力介紹這一理論。但是，即便是都留本人，也尚未在這一本白皮書中使用經濟增長一詞。當時說明經濟概況時，通常使用的是「工礦業生

產十分低迷……物價持續攀升」等老套的表述。

這種情況並非不可思議。因為如果不具備將國民經濟作為一個整體、以附加值來計算每年經濟活動的總生產量這樣一種經濟統計方式，以增長率來表現經濟增長就無從談起。如工礦業生產指數、物價指數等所示，人們在相當長時期以前就已開始嘗試進行統計性觀察，但如果要把握服務的生產量、政府經濟活動總量等，就需要凱恩斯經濟學需求管理政策等所提倡的經濟學的新發展，以及新開發的經濟學認知手段。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經濟政策的制定者們開始關注並利用這些剛剛發展起來的宏觀經濟學新方法。日本也很快借鑒起這一新的潮流。

經濟安定本部（即之後的經濟企劃廳）於一九五〇年前後開始，著手推算國民經濟的總額。在一九五一年版《白皮書》中首次採用了國民收入調查室的估算，在以「國民收入與生活水平」為題的項目中第一次提及該室的推算結果。但問題在於，他們只是做了消費支出與戰前水平的對比。因此，儘管這一統計逐年積累，但在一九五五年之前的《白皮書》中，關於這一推算也只能作如下的說明，「（昭和）二十九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比前一年增長了約百分之三，約兩千億日元，除去物價變動因素，實際增長額也達到百分之二……但二十七年度和二十八年度曾分別實現

百分之十一點六、百分之十五點八的急速膨脹，與之相比，增長顯著放緩」（《昭和二十九年度的年度經濟報告書》）。雖然這時已經有了「與前一年度相比出現增加」等表述，但是在此前後「經濟增長」的說法也好，「增長率」的說法也好，都還難覓蹤影。

預測「未來景象」

一九五六年的《白皮書》第一次使用了「高度增長率的秘密」、「增長率放緩與投資誘因的減退」等表述。《白皮書》的結語，在那句家喻戶曉的「已不是戰後」之後，緊接著指出，「我們如今面臨業已變化的事態。通過恢復而實現的增長已經終結。今後的增長將由現代化加以支撐」。一九五六年的《白皮書》以「日本經濟的增長與現代化」為副標題，正是基於這一判斷。就這樣，「經濟增長」這一描述經濟活動實際情況的重要詞彙，與那句深刻在人們腦海中的「已不是戰後」的表述一起，登上了歷史的舞台。

《白皮書》的這番表述一向被視為是與戰後訣別的宣言，但實際上其強烈的意圖在於預告：要實現現代化這一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將是一大困難課題。

《經濟白皮書》中「已不是戰後」這一表述被認為不過是借用了中野好夫的評論。中野在評論中更為清晰地強調了上述預想中的困難。在一九五六年二月號的《文藝春秋》上投稿的《已不是「戰後」》一文中，他著眼於當時正在進行的

保守聯合，敲響警鐘，告誡世人舊世代有可能復活，並呼籲應該迎來一個擺脫戰後意識、有著明確未來願景的時代。（《高速增长與日本人》三）

以保守聯合為基礎而成立的第三屆鳩山一郎內閣中，十八名閣僚中有十三名曾被開除公職。所謂「舊世代的復活」正是指以此為象徵的、戰前政治領導階層回歸極為顯著的背景。（增田弘《解除開除公職的影響》）曾被開除公職的政界回歸者在歷任內閣閣僚中佔的比例逐漸上升，到了第五屆吉田茂內閣（一九五三年五月成立）時已超過一半。保守聯合之後，鳩山內閣中這一比例已經超過七成，舊世代復權的印象可謂眾目昭彰。因此中野提出「已不是『戰後』」，大概也含有與戰前訣別之意，要把未來託付給新的一代。

當時，直面日本在戰敗後成為小國這一現實，中野主張應向亞洲、非洲的「小國」學習，作為小國朝著實現人人幸福的理想努力。這樣，在中野描繪的未來景象中，戰後的終結固然有追求時代新精神的革新意味，但也意味著，日本作為小國，正站在朝著建設理想中的國家前進的起點上，前途困難重重。預測在走向必經的未來時，路上會遇到的種種艱難險阻，在這一點上，《白皮書》和中野好夫之間可謂不謀而合。

但是，儘管與作者的意圖有出入，「已不是戰後」這一說法卻只被接受為是

與戰敗後經濟復興與苦難的訣別。無論如何，《白皮書》以「經濟增長」這一適用於新時代的新思路來描繪必經的未來，預告了時代的轉換。

就這樣，「經濟增長」一詞成為戰後日本經濟社會的象徵性表述。但與中野「已不是『戰後』」中所包含想法大不相同，日本開始邁上了不停奔向經濟「大國」之路。

急速狂飆 的時代

關於「經濟增長」一詞的含義，大多數的國民並不理解這是與國民收入相關的推算。幾乎無人知道，雖然這是表示經濟活動總量的概念，卻無法完全反映生活水平的質量，在推算時還遺漏了家庭勞動等重要的經濟活動等。每個人都只是持著對「增長」一詞的固有印象做出直觀反應，就好比是通過家中柱子上畫的刻痕來測量孩子身高那樣來看待所測得的日本經濟擴大的規模。

正因如此，當《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發表時，在很多國民看來，所謂「收入」就是工資袋的袋中之物，而所謂「倍增」大概就是工資翻番。這也表現了當時將國民收入倍增與「工資翻番論」混淆、對其期待不斷高漲的時代狀況。

一九六〇年《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發表兩年後，林周二所寫的《流通革命》（中公新書）一時洛陽紙貴。在該書中，林周二將流通革命的歷史必然性用「世態

的加速化」加以形容。林周二以加速化的衣食住為例，強調日用商品與時代一起高速變化。通過訴諸每個人都實際感受到的日常生活的加速變化，林巧妙地描繪了高速增长時期的時代特徵。這是因為，不管增長根據甚麼計算，不管這些統計數值為何物，在人們對經濟增長的認識中，總是最關心變化的大小和快慢（變化率）。因此，這一認識也經常會伴有對於生活質量的關心漸漸退居二線等被視為發展經濟所導致的弊端等問題。

這點姑且不談，《流通革命》一書之所以傳閱甚廣，顯示出「經濟增長」一詞在《白皮書》首次使用僅僅六年之後，在對其內容仍一知半解的情況下，很多人已開始以肯定的態度接受這一概念。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前後泡沫崩潰後，在近乎於零的超低增長率下，人們以「高速增长經濟」時代為衡量標準，對眼前蔓延的經濟事態頗感異常。「增長率的恢復比甚麼都不可或缺」，幾乎沒有人對這一說法心存異議。雖有恍若隔世之感，但也真的說明「經濟增長」一詞自誕生四十餘年來已深深滲透至我們的日常經濟觀念中，並牢牢佔據了中心位置。

本書所要講述的正是這一「經濟增長的神話」深深滲透到每一個日本人心中的時代。

第1章

一九五五年與一九六〇年：政治的季節



杉並區的主婦們為一九五六年第二屆禁止
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開展簽名運動（柴垣和
夫《昭和的歷史 第九卷 從講和到高速增
長》，小學館，一九八三年）

一、轉機的一九五五年

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

「經濟增長」一詞獲得國民認同的一九五五年前後，國際局勢也好，日本國內的政治體制也好，抑或是日本的經濟社會狀況，在各種意義上都面臨著轉機。

一九五三年朝鮮戰爭休戰後，國際緊張局勢有所緩和，上述變化正是這一趨勢下產生的結果。翌年一九五四年通過了《印度支那戰爭休戰協定》。一九五五年七月，召開美、英、法、蘇四大國領導人會談，被認為在冷戰時期開啟了緊張局勢緩和的大幕，宣示了以抑制嚴重軍事對立為要旨的「日內瓦精神」。在會談中，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古拉·布爾加寧提議，四大國在任何時候都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對此回應，提議各國應避免採取突然襲擊。這一會談被認為開啟了冷戰的「解凍」，會談後歸國的英國外務大臣哈羅德·麥克米倫提出現在「已沒有戰爭」，直率地傳達出會談的友好氣氛。藉著這一「解凍」的東風，同年六月日蘇已開始在倫敦談判，九月蘇聯和西德兩國也召開了恢復邦交的莫斯科談判。

然而，這一抑制對立的努力並未立刻產生具體、有效的成果。裁軍談判逡巡

不前，而且正是在談判的最高潮中，以開發核武器為核心的激烈的軍備競賽有增無減。即便是外務大臣提出「已沒有戰爭」的英國，在其《國防白皮書》中也表明將積極製造氫彈。此外，備受期待的關於德國統一的外交部長會議也沒有取得足夠的成果。

即便如此，在召開領導人會議的日內瓦，後續的各種會談接踵而至，繼續進行著緩和緊張局勢的各種嘗試。比如一九五五年八月，首次召開了由世界七十二個國家的科學家參加的和平利用核能國際會議，與會者在廣泛範圍內交換了與核科學技術相關的信息和意見。人們期待，這或許是預示變化的徵兆。

萬隆精神

東西對立是冷戰的主角，在這一對立不斷變化的過程中，曾經淪為那些國家的殖民地而受到支配的亞非各國，也作為第三種勢力不斷增強其存在感。這是這一時期的世界局勢中不容忽視的新動向。

一九五四年在印度支那休戰會議期間，中國的周恩來總理與印度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總理發表了關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共同聲明，即，第一，相互尊重領土主權；第二，互不侵犯；第三，互不干涉內政；第四，平等互利；第五，和平共處。尼赫魯總理謀求以上述原則為基礎，擴大冷戰的中立地區。

基於這一考慮，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召開了第一屆亞非會議。與會的二十九個國家通過了在共同聲明基礎上修訂的「和平十項原則」。亞非各國在政治經濟體制的選擇上展示出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中立主義等多樣性，但它們卻齊聚一堂，就反殖民主義、民族自決、完全獨立等問題達成一致，共同誓言彼此合作。此次會議的基調象徵著第三方勢力的登場，被稱為「萬隆精神」。這顯示了國際格局多極化的進展，同時也讓人切身感受到，在經濟上仍處於發展中階段的各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擁有不容忽視的話語權。「前言」中所介紹的中野好夫的「小國」理想，正是基於對這些亞非國家的存在方式的一種共鳴。

二、獨立後的政治不安

《和平條約》 的背景

在此之前的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前後經歷八年的對日佔領終於打上了終止符。但是，在一片批判其為片面講和的聲音中，日本如何終結與多數交戰國的戰爭狀態這一課題仍懸而未決。

直到一九五五年迎來轉換期之前，朝鮮半島經歷了包括熱戰在內的東西對立，上述遺留問題正是這一對立所產生的後果。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和平條約》簽字前後，西方各國以冷戰體制為前提，積極強化軍備，明確同盟紐帶。九月十一日，在華盛頓召開的美、英、法外長會議同意西德重新武裝，決定了用和平協定取代正式和平條約的方針；十五日，於加拿大渥太華召開的第九次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理事會決定了土耳其和希臘的加盟。在這種形勢下，又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下旬分別在波恩和巴黎簽署了《和平協定》和《歐洲防務共同體條約》。這樣，西德確定歸屬西方一側，與德國統一的道路漸行漸遠。

日美之間也締結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這是美國基於「中國威脅論」在太平洋地區締結相互防衛協定的系列舉動中的一環。日美條約締結前的一九五一年八月，在檀香山召開了澳新美安全條約（ANZUS）理事會會議，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就其意義進行了說明：「基於中共對太平洋地區所造成的安全威脅這一觀點，我們討論了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三國之間的共同利益與關係。」這是美國第一次言及「中共的威脅」，並強調太平洋地區安全保障的重要性。

美國進而與菲律賓締結了《相互防衛條約》，增加了對法國的援助，後者正

為應對越南民族獨立運動焦頭爛額。這些舉動都反映出，美國對於朝鮮半島休戰協定難以取得進展越來越具有危機意識。

總之，日本的獨立，也只不過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部署的一個環節。因此，針對未被邀請參加舊金山和會的中國，日本與美國的「中國威脅論」統一步調，選擇了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台灣政府）締結《日華和平條約》。但在談判中，吉田茂首相向國務卿特別顧問約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提交了《吉田書簡》，《吉田書簡》提出「日本對大陸政府頗感興趣，我們認為，從日本的地理條件來看，不可能無視大陸而生存」，因此，「只是將國民政府作為有限政府與之締結條約」。這被視為「是吉田首相所能想到的極限」，「首相心中有著強烈的想法，將來在適當的時機尋求與大陸再啟邦交」（《朝日年鑑》一九五三年版）。然而，恢復邦交在此後二十餘年都未實現。

關於締結《日華和平條約》，《華盛頓郵報》寫道，「台灣國民政府的治國無方、獨裁政府和腐敗在世界上可謂臭名昭著……日本政府與這一政府締結條約，承認其為中國的正統政府，實在是自絕於亞洲各國之友，無異於自行將亞洲各民族置於不友好關係之中」（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日本政府的決定儘管是追隨美國的外交戰略而做出的，但卻在美國內部也飽受批判。（笹子勝哉《政治資金》）

和談所遺留的問題

《和平條約》留下了諸多問題。與沒有參加講和的東方各國，特別是與蘇聯恢復邦交，對於日本解決領土問題、漁業權問題等重要課題不可或缺。但是，因為日本本身屬對立結構的一方，也就意味著與解決之途漸行漸遠。正因如此，加入聯合國等國際機構也困難重重。

在與亞洲近鄰各國恢復關係方面，也殘留了諸多問題。

與中國一樣，韓國也未受邀參加對日和談，與其恢復邦交的問題儘管已交付雙邊協議，但國籍問題、繼續保留既得權益問題等仍懸而未決，特別是漁業權問題糾紛四起。因此，就在和約生效之前（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日韓中止會談，兩國未能開啟正式外交關係，一直拖到一九六五年才實現。

東南亞地區是太平洋戰爭的主戰場，為數眾多的國家對於美國提出的無賠償的講和原則表示異議，最終也沒有參加《和平條約》，因而遺留下日本與這些國家恢復邦交這一重要課題。

在日本國內，問題在於，其所締結的《安全保障條約》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行政協定》使日本恢復主權受到一定制約。特別是《行政協定》被視為承認了事實上的治外法權，這不過是對美國既得權益的保護。一些人曾滿心期待能夠解除美國的接管，對此不免灰心沮喪。因此，在政府允許美國無限制使用的石川縣



圖 1-1 為了阻止建立靶場，當地居民在著彈地點建起小船屋，靜坐示威（內灘鬥爭）。（松尾尊兌《日本的歷史二十一 向著國際國家出發》，集英社，一九九三年）

內灘靶場等地區，反對基地的鬥爭不斷擴大。而且，沖繩、小笠原等地區儘管被認定為日本的固有領土，但日本卻未被認可恢復對其行使主權，而是被留作美軍的軍事基地，因而這些地區的「回歸」問題成為長期的懸案。

在一九五二年《朝日新聞》所作的輿論調查中，關於締結和平條約，百分之四十一的人認為「感到高興」，百分之二十三的人認為「雖覺安心但也不能一味

高興」，整體上對講和和獨立表示歡迎。與此同時，對吉田內閣的支持率卻從前一年九月講和會議前後的百分之五十八驟降到一九五二年三月的百分之三十三。（以下各項均出自《朝日年鑑》一九五三年版）

此外，認為最好與蘇聯講和的佔到百分之五十四，超過半數，而關於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百分之十一的人認為「姑且這樣就行」，與之相對應，百分之五十七的人認為「這樣不行」，可見輿論迫切要求解決講和遺留的諸多問題。

另外，關於美軍駐留的問題，百分之四十八的人回答「希望」，百分之二十的人回答「不希望」，百分之十六的人回答「沒有辦法，怎麼都行」，百分之十六的人回答「不知道」。先不論基地周邊的居民，在對於這些問題沒有切身感受的國民中間，也存有一種很強烈的想法，即通過駐軍實現安全保障也是不得已的辦法。同時，雖然（百分之三十三的人）將成立警察預備隊的目的認作是為了維護國內治安，但心裡仍覺不安，擔心總有一天會不得不重整軍備。另一方面，大多數國民（百分之六十四）忌諱徵兵制度，認為即便要創立軍隊，也應該實施志願兵制度。這反映了人們抗拒那些勾起戰爭幽暗記憶的情景再現，哪怕這種抗拒是消極的。

一九五二年三月初，吉田首相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聽證時答辯道，「憲法禁止將武裝力量用於國際紛爭，但並沒有禁止用做自衛目的」，同月十日又收回了這一發言，這激起了對重整軍備和關於憲法第九條解釋的重重疑問。在這種情況下，對於政府依據憲法「不再重振軍備」的聲明，大部分國民回應以「贊成」（百分之十二）、「敷衍之詞」（百分之四十八）和「不知道」（百分之四十），這或許也是對東西方對立日益嚴峻的一種反應。

開除公職與政局不穩

一九五二年五月三日，《和平條約》生效，為此在皇居前廣場舉行了獨立紀念儀式，而兩天前的「五一節」剛剛在這裡發生了流血事件。這並不僅僅是保守勢力與以勞工運動為基礎的革新勢力間的對立，保守革新兩大陣營內部也紛爭四起，圍繞講和問題，國內局勢動盪不安。

伴隨著和談，原先遭到開除公職處分的人士被紛紛解除處分，這對上述政治局勢造成影響。從一九五一年年末到一九五二年開春，日本政府解除了政界和財界中大批人士受到的開除公職的處分。在政界，鳩山一郎、緒方竹虎、岸信介等人重新開始政治活動，戰前的政治群體起死回生，警察預備隊和海上警備隊也開始任用舊軍人。特別是，前自由黨總裁鳩山一郎被解除開除公職的處分，使其在自由黨內部與吉田首相就政權授受問題產生的對立不斷激化。

與之相對，在在野黨內部，原外相重光葵的重新掌權使改進黨懸而未決的總裁問題得以解決，河上丈太郎的回歸也為右派社會黨解決委員長問題打開了一個突破口。在這種情況下，各黨派和各派系之間圍繞各自領導體制的主導權之爭進一步激化，孕育出政界重組的動向。

一九五二年六至七月的第十三屆一般國會末期，執政黨一味忙於內部紛爭，「法案審議也扔在一邊」。進而在十月的大選中，自由黨又陷於吉田派和鳩山派的激烈黨內鬥爭中，好不容易才取得了過半數的席位。翌年三月，鳩山系就分裂結成了分黨派自由黨（分自黨），五月成立的第五屆吉田內閣變成了少數單獨執政內閣。由此，政府的各種施政都停滯不前，一九五三年度的預算到七月為止都不得不設為臨時預算。

經濟上，在外匯不足的情況下，日本還面臨著「高煤價、高鐵價」等基礎材料的價格高企，經濟擴大受到制約。戰時的國家管理體系已經被解體，電力行業被重新整編為九個地區性民營電力公司，但其電力開發進展遲緩，出現了計劃停電常態化等電力不足的情況。

基於以上狀況，財界要求努力實現政治穩定的呼聲日益強烈，一九五二年十月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聯）會長石川一郎與自民黨幹事長林讓治會面。第二天，經團聯、日本商工會議所（日商）、日本經營團體聯盟（日經聯）、經濟同友會等四大經濟團體通過了《關於穩定政局的緊急請願》的決議，日商會長藤山愛一郎與經團聯副會長植村甲午郎等六位財界人士遍訪鳩山自由黨的幹部們，要求其努力實現政局穩定。

然而此後政局卻並未穩定下來。由於在翌年一九五三年四月的大選中，自由黨並未獲得過半數席位，財界在五月再度提出《關於基本經濟政策的意見》，要求保守政黨彼此合作。表面上看，確有看似政策對立的地方，但實際上從頭至尾幾乎都是保守陣營內部為了主導權展開的爭鬥，他們被批評為在政策討論上未盡全力也是理所當然。

對立結構

自由黨與改進黨身為保守二黨，彼此之間卻存在一種對立結構。改進黨主張重整軍備，而自由黨儘管在事實上也認同重整軍備，但在表面上卻對重整軍備持慎重立場。在是否重整軍備這一點上，自由黨的主張與革新陣營的主張比較接近，而在經濟政策上，改進黨認為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有所修正的「大政府」必不可少，因此與革新陣營更為接近。

在這一背景下，一九五三年四月的大選之後出現了以改進黨總裁重光葵為首的中間派聯合政權，從政策選擇面上來看，這一政權選擇餘地頗大。（中北浩爾《一九五五年體制的成立》）但這一聯合政權的工作卻陷入重重挫折。結果，保守和革新的對立更為顯著，焦點在於是否重整軍備這一憲法問題。自由和改進兩黨之間的對立也頗為嚴峻，保守陣營要想實現統一尚需時日。

一方面，在革新陣營內部，社會黨圍繞如何評價舊金山和會也出現了分裂。左派對《和平條約》也好，對《安保條約》也罷，均持反對態度；與之相對，右派則贊同《和平條約》。之所以出現這種分裂，是因為以國鐵勞動組合（國勞）^①、全遞信勞動組合（全遞）^②、日本教職員組合（日教組）為核心的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總評）主流派（左派）基於「和平四原則」（全面和談、堅持中立、反對軍事基地、反對重振軍備），對於《和平條約》一貫持反對態度。總評左派所結成的「勞動者同志會」在一九五一年十月臨時黨代會上造成了社會黨左派的分裂。這是社會黨左派與總評開始其密切關係的起點。（升味準之輔《日本政治史四》）

另一方面，社會黨右派認為提高自衛能力是獨立的前提，因此抵制包括「反對重整軍備」在內的「和平四原則」。右派以日本屬於西方陣營為前提，指責國際共產主義的威脅，將提高自衛能力作為政策目標之一，主張與共產黨劃清界限。從如此深刻的意見對立來看，社會黨的分裂也實在是自然而然而之事。

戰後，政治影響力日益增大的日本共產黨，因黨內的路線對立，內部紛爭

① 日語中，工會被稱為「勞動組合」，其縮寫「××勞」即「××工會」。下文多處「勞動組合」除出現在該組織名稱中之外，一般直接翻譯為「工會」。

② 全遞信勞動組合是由郵政從業員工組成的一個工會，其前身是一九四六年成立的「全遞信從業員組合」。

和混亂持續不斷。由於和談前後，組織燃燒瓶鬥爭、山村工作隊^③等方針，這一運動逐漸失去了大眾基礎。一九五五年，共產黨召開了第六次全國協議會（六全協），為此前的運動方針打上了終止符，其路線轉換成以大眾運動為基礎的民族解放統一戰線。

此起彼 伏的貪 污疑案

由於保守政權的腐敗事件浮出水面，如一九五三年十月被發現並演變成政治事件的保全經濟會事件、翌年一九五四年一月被揭露的造船貪污疑案等，政治混亂程度進一步加深。

保全經濟會作為特殊盈利機構在全國二百零七個地方設有分店，從十五萬中小工商業者、農民、漁民等處籌得四十五億日元的資本金，卻在一九五三年十月由於無力分配紅利而陷入停業狀態。司法部門對其以欺詐嫌疑開始搜查。此時，坊間流傳該會正向政界提供大量政治獻金。針對這種黑金傳言，參議院行政監察委員會於一九五三年年末開始推進調查，翌年二月傳喚了平野力

③ 山村工作隊是一九五〇年代前期「日本共產黨臨時中央指揮部」領導下的以武裝鬥爭為目標的秘密組織。這一組織受到中國共產黨農村鬥爭經驗的影響。

三（社會黨右派）、早稻田柳右衛門（改進黨）兩位眾議院議員為首的一千證人。席上，平野力三做出如下證言，「聽說保全經濟會的伊藤（斗福）理事長向自由黨的廣川弘禪、池田勇人、佐藤榮作，改進黨的大麻唯男，舊鳩山派的三木武吉等人提供了捐款」（《朝日年鑑》一九五五年版），該事件由此驟然成為政治問題。

問題的焦點在於：第一，人們懷疑相當數量的政治家藉著該會顧問等頭銜，為其資金募集行便；第二，懷疑保全經濟會及類似金融盈利機構對保護立法運動進行了賄賂。關於第二點，在野黨方面要求時任大藏大臣的池田勇人作為證人出席聽證。但是，短時間內與之相關的各派系間的對立難以緩解，最終二月中旬進入了暫時冷卻期。

此後，在作為爭論焦點的傳喚池田一事並未實現的情況下，國會的討論轉向了波及政界的造船貪污疑案。由於江戶橋商事的森協將光社長的告發（一九五三年八月），日本特殊產業的豬股功社長被捕。在豬股功的口供中，曝光了對山下汽船、日本海運、日本通運等企業的非合法賬外放款事件。一九五四年四月，在逮捕山下汽船的社長橫田愛三郎後，司法部門獲得了確切的證據，決定揭發海運業界圍繞計劃造船的比例和《利息補助法》等進行的大量賄賂，並逮捕了大型造船公司的幹部以及運輸省官房長官等。進而，二月中旬自由黨副幹事長有田二郎也

遭到逮捕，該事件演變成問責吉田內閣的嚴重政治問題。此外，同一時期日本交通公社、鐵道弘濟會本部^①、帝都高速交通營團^②等一同被檢舉的「陸運貪污疑案」也浮出水面。

針對這一事態，在二月十九日的國會眾議院決算委員會上，有森協社長陳述道「《造船利息補助法》通過前後，政官要人與業界幹部在料亭街見面確是事實」，在二十二日該委員會的會議上，改進黨的中曾根康弘更為赤裸裸地質問道「石井（光次郎）運輸大臣、大野（伴睦）國務大臣收著產業界的錢吧」，各方的嚴厲追究持續不斷。（同前載書）

在此之後，從二月下旬開始，要求自由黨政調會長池田、外相岡崎（勝男）、自由黨幹事長佐藤等人的協助調查持續進行，以此為契機，在野黨也進一步強化問責，以期迫使吉田內閣總辭職。逮捕佐藤幹事長等人被認為是遲早的事。

檢查廳在四月中旬迎來了搜查的最終階段，確定了要求逮捕自由黨幹事長佐藤的方針。但是，法務大臣犬養健卻在二十一日領會吉田首相等人的意圖，根據

① 鐵道弘濟會是一九三三年成立的福利團體，主要救濟和援助的對象是因公殉職的鐵路員工的家屬和因公負傷的鐵路員工。

② 帝都高速交通營團是一九四一年至二〇〇四年間主要經營東京都內地鐵的政府機構。

《檢察廳法》第十四條的規定行使指揮權，下令逮捕行動延期。這種異常的舉措使得對吉田內閣的批判進一步加強。至此，因法務大臣行使指揮權阻止對佐藤進行逮捕，對貪污事件的搜查事實上已經失敗。當時因與政界的關係而接受調查的多達近百人，然而僅有五人被以賄賂嫌疑起訴，只有一人以違反《政治資金規正法》嫌疑被起訴，剩下的基本被緩期起訴或免予起訴。在此後的十餘年間，曾陷入懷疑漩渦中的池田、佐藤等人相繼組閣，由此可見，這一造船貪污事件的終結方式對於戰後日本政治的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

特需消失 後的不安

日本經濟由於朝鮮戰爭的特需而獲得復興的契機，但此後由於休戰，特需消失，又陷入了復興是否將被釜底抽薪的不安之中。資源不足的日本經濟要想自立，原材料的進口必不可少，因此外匯不可或缺。但是，獲得這些外匯的出口產業競爭力匱乏，日本商品在海外市場被認為「價廉質劣」，聲譽不佳。不僅如此，作為戰前日本重要出口地區的中國和東南亞等地，由於賠償問題尚未解決、短時無望恢復邦交等原因，無法對其大部分市場抱有多大的期待。

隨著美國要求強化日本防衛能力，《相互安全保障法》(Mutual Security

Act，一九五一年十月實施）浮出水面，有人指望以此為基礎的援助（MSA援助）可以彌補上述缺失。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於一九五三年七月在參議院聽證時言及關於日本設立十個師團的構想，次月的訪韓歸途中，他與吉田首相進行會談，要求日本加強防衛能力。根據這一要求，日本同意開始日美談判，「防衛增強計劃的提出與MSA援助金額的決定之間可以說就是一種交易」（《朝日年鑑》一九五四年版），這道出了日本經濟的弱點所在。

美方很早就把MSA援助視為增強同盟國防衛能力的重要手段。六月助理國防部長弗蘭克·納什（Frank Nash）在眾議院聽證會上說，「如果向日本提供MSA援助，最終將節省美國的經費。相比美國陸軍在日本繼續駐紮，進行MSA援助將會節約五倍甚至十倍」，這明確地顯示了美方的意圖。（同上《一九五五年體制的成立》）

MSA援助可用於補充特需的減少，吉田內閣雖然也對此充滿期待，但認為，若將加強防衛能力作為提供援助的前提，就會擴大財政負擔，因此持抵制態度，要求優先加強經濟能力，隨著經濟能力的提升再相應地增強防衛能力。「輕武裝、重視經濟」成為吉田所考慮的基本路線。十月，作為吉田首相特使出訪的池田勇人在與助理國務卿沃爾特·羅伯特森（Walter Robertson）會談時提出了《防衛能力五年計劃池田個人設想》，雙方在並未達成明確協定的情況下發表了共同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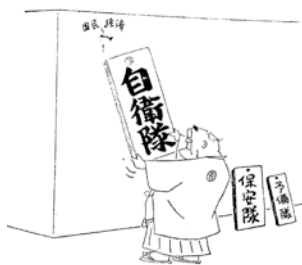


圖 1-2 自衛隊創立之際，《讀賣新聞》（一九五四年三月七日）刊載的一幅西村晃一所作的諷刺漫畫。（岩崎爾郎、清水勳《值得一讀的年表·另卷 昭和的諷刺漫畫與世態風俗年表》，自由國民社，一九八四年）

明。這一個人設想的內容是，增強日本陸軍體制，從第二年度開始的三年間內增至十八萬人的規模。這是池田與大藏省內的親信小組制定的計劃，與保安廳無關。該設想表現了日本方面重視經濟的姿態。（佐道明廣《戰後政治與自衛隊》）在這一談判背景下，日本國內於一九五四年七月設立了防衛廳和陸海空自衛隊。

除了對外匯的不安之外，經濟方面的懸案也堆積如山。特別是經濟界對於受到戰後改革影響所制定的諸多制度強烈不滿，對獨立前後就已開始的佔領政策作了諸多修改，如修訂《禁止壟斷法》、廢除獨立行政委員會制度等。誕生不久的公益事業委員會也被廢止，教育委員會喪失了獨立性，管轄官廳恢復了與戰前一樣的權限。另一方面，《禁止壟斷法》對限制卡特爾等的各種條件作了鬆綁，此後開始摸索以合理化和應對不景氣對策等為目的的卡特爾活動，並制定《壟斷禁止法》適用例外法案等。

另一方面，勞工運動作為社會黨等革新勢力的基礎，一如既往地處於嚴重的

對立態勢，這也反映出激烈的政治對立。如前所述，總評由左派主導，強化了被概括為「和平四原則」的政治要求，以罷工為主要運動形態的激烈對決姿態主導著勞工運動。與之相對應，在經營者方面，經濟同友會等脫離了戰後初期所提倡的勞資協調的企業民主化論，以恢復經營權為口號加強了對決姿態。這也進一步加強了保守與革新勢力在議會中的對立。

三、保守聯合與五五年體制

政界重組的動向

從一九五三年秋天開始，在懸案堆積如山的狀況下，保守與革新兩大勢力圍繞如何收拾混亂的政局，開始各自探索如何實現再次集結、嘗試構築新的政治體制。

在保守勢力方面，由於自由黨的分裂（一九五三年三月，結成了分黨派自民黨），吉田首相在議會中處於劣勢。九月末，吉田茂與改進黨總裁重光葵以防衛問題為中心交換了意見，形成了大體一致，並以此為契機，構思實現自由、改進黨的合作與聯合。由於改進黨內部存有對這一構想的反對之聲，這就成了左右政局的焦點之一。直到十二月重光葵總裁表明其政治信念，即「在政策上如果與自

由黨一致就合作，但不與吉田內閣聯合」（《朝日年鑑》一九五五年版），這一構想也就隨之消散。

另一方面，吉田首相在十一月中旬拜訪了分自黨總裁鳩山，要求分自黨無條件恢復黨籍，在同一天的會談中，他就設置憲法調查會、設置外交委員會等焦點問題，做出了讓步的姿態。鳩山總裁表示同意，到十一月底，除了一部分強硬派之外，分自黨黨員都恢復了黨籍，翌年即一九五四年開始出現保守聯合的問題，這一再度集結的動向不過是該問題的序曲而已。

為了應對保守勢力方面的舉動，社會黨的左右兩派也表現出相互讓步，十月召開了兩黨委員長和總書記的會談，約定在國會中強化共同鬥爭。不過，之後兩黨在基本路線上仍暫時處於對立，未見積極趨勢。一九五四年一月的黨代會上各自以「社會主義政治勢力的集結」為題，最終只是通過了為實現統一而努力的方向針。（同前出處）

吉田首相 的下台

在這種狀況下，一九五四年一月由於政治問題化的保全經濟會問題與造船貪污事件，國會內執政黨與在野黨的對立進一步激化，六月發生了憲政史上前所未有的國會群毆事件，國民的政治不信任感進一步加強。



圖 1-3 一九五四年六月三日，執政黨與在野黨議員圍繞眾議院會期延長問題展開的群毆（辻清明《圖說 日本的歷史十八 戰後日本的再出發》，集英社，一九七六年）

針對這一情況，執政黨自由黨在三月末由副總裁緒方竹虎發表了旨在打破局面的關於「保守聯合」的構想。以此為契機，關於保守聯合的討論日趨活躍。到五月末，自由黨、改進黨、日本自由黨三大黨派開始正式磋商。但是，自由黨主流派的目標在於強化吉田內閣，與此相對，很多人反對將吉田下台作為結成新黨的前提，三黨的磋商在總裁問題遇到巨大阻礙。

此後，七月三日以自由黨反吉田派和改進黨的自改合作派為核心，成立了以結成新黨為目標的新黨結成準備會（之後改稱為新黨結成協議會），與吉田內閣的對立姿態進一步強化。到了九月，結成以鳩山一郎為核心的保守新黨的各項動作真正展開，十一月二十四日，自由黨的岸派和鳩山派、改進黨、日本自由黨共同集結，召開了日本民主黨的成立大會，保守政界由此出現了自由和民主兩分天下的狀況。

吉田首相之前一味堅持解散議會、舉

行大選等強硬方針，但鑒於自由黨內的大局已定，不得不選擇於十二月七日內閣總辭職。吉田首相本人也受到了脅迫，「就算是總裁，要是亂來，也得除名」，在他本人缺席的情況下，內閣會議通過了總辭職的決議。（同前載書《日本政治史四》）取而代之的是於十日誕生的、以日本民主黨鳩山一郎為首的新內閣。肩負政權七年之久的吉田體制就此打上了終止符。

鳩山內閣 的成立

由於在野三黨在首相提名的磋商上達成了於一九五五年一月末解散眾議院等協議，因此新成立的鳩山內閣只是一個選舉管理內閣。基於這一協議，在一九五五年二月進行的大選中，民主黨確保了一百八十五個議席（解散前為一百二十四席），成為第一大黨；自由黨慘敗，從一百八十席驟減到一百一十二席。另一方面，與會的社會黨左右兩派之前已承諾統一，也獲得了總計一百五十六個議席（解散前為一百三十五席），革新勢力確保了三分之一以上的議席。因此，作為保守和革新勢力對立焦點的憲法修訂動議在事實上已不可能成功。在大選後的第二十二屆特別國會上當選為新首相的鳩山一郎組建了民主黨的單獨內閣，確立了與自由黨協調推進國會運營的方針。

後記

本書的基本觀點在於「高速經濟增長」這一概念不過是時代的產物。借用一九五六年《經濟白皮書》的表述，應該認識到，一九八〇年代初我們「已不再是高速增長的時代。我們正在直面不同的事態。通過增長追求富裕的餘地已使用殆盡。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要保護環境、維持有節制的生活，就需要分配的公正」。但為甚麼又做不到這些？這是今後也需要思考的問題。

作為系列叢書中的一本，「您能否寫寫高速增長期？」受此邀約之時，我就覺得機會難得，甚為感激，想著反正就是把戰後經濟史整理一下，便以這種輕鬆的心情接受了邀請。

但是，這一想法太天真了。我向初次作者會議所提交的關於戰後經濟史設想的大綱被編輯委員會的各位一口回絕。說既然是通史，建議在政治史、社會史等更為廣闊的視野中重新思考。因此，本書對我而言是基於「備選方案」，對於諸多門外的事項盡力提及所成之結果。

儘管如此，要求的範圍實在太過寬泛。我的專業領域是現代經濟史，而非

戰後史，即便是經濟內容，也無十足把握。不管怎樣，按照順序把《朝日年鑑》一路讀下去，邊讀邊記筆記吧。沒想到這活卻挺有意思。流行語也好，輿論調查也好，暢銷書也好，做了一堆筆記。遺憾的是，我最終卻沒能用盡這些筆記，絕大多數被束之高閣。結果，下筆的範圍只停留於政治和經濟史。對公害問題等的論述仍不充分，孩子們與時俱變的樣子等其他內容也留下了眾多想寫而未寫的題材。

在這有限的範圍內，本書有太多部分參考了大量的已有研究，儘管如此，註解卻難言充分。沒有一一標記的部分，可參閱參考文獻中列舉的研究。各位讀者，哪怕只有其中的一冊在手，亦可獲益匪淺。

在後記的結尾，總希望可以不用寫上「我拖稿了，給大家添了不少麻煩」之類的話，但本書卻做不到這一點。編輯部的上田麻里女士始終耐心等待不知何時才能完成的初稿，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武田晴人

二〇〇八年三月